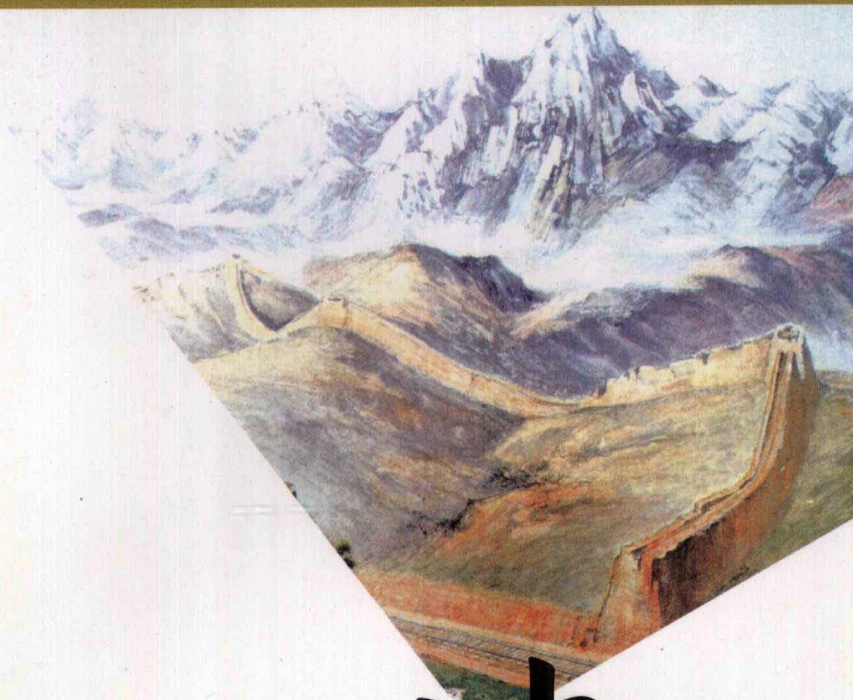




英明决策

传世藏书 · 红色文丛

刘少奇的一生

唐 涛等 / 主编
远方出版社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传世藏书·红色文丛

刘少奇的一生

英明决策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托雅

封面设计:洛 扬

传世藏书·红色文丛

刘少奇的一生

英 明 决 策

主 编	唐涛·等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教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820
字 数	4880 千
印 数	5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009-6/I·6
总 定 价	1800.00 元
本册定价	20.00 元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前 言

每一个伟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每一个伟人又都是他自己适应和把握那个时代的要求而努力不已的结果。在人民的革命运动中自然要产生出自己的领袖来；但领袖绝不是自封的。

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我们党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名字，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息息相连。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刘少奇虽然饱受中伤、污蔑，蒙冤而死，但他的功德将永垂青史，昭示天地，与日月齐辉。正如他自己生前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在 70 多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中，他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建立了永不磨灭的功勋。

怀念伟人,我们怀揣深情:对伟人思想进行政治上高屋建瓴的总结,我们认真地领会;对伟人所历经重大事件的宏观罗列,我们细心地回味;对伟人历史足迹的追溯,我们虔诚地拜访……回顾伟人波澜壮阔的一生,我们深深体会到他们在历史、时代的前沿中所思所行。站在巨人"肩膀"的顶端,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我们要像伟人那样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不断解放思想,像伟人那样锻造不屈不挠、奋斗不息的拼搏精神,像伟人那样树立以国家人民利益为第一的行为宗旨。时事造英雄。21世纪的中国也迫切需要改革开放的挑大梁者。我们青年一代,勇往直前吧,去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

伟人的思想成就卓越,由于受篇幅所限不能全部囊括。在此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

编者



目 录

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	(1)
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	(6)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抗战时期形成过程中的刘少奇	(6)
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之缘	(19)
宝塔山下的盛会——中共七大纪实	(42)
刘少奇修改党章的报告和新党章的制定	(68)
对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	(72)
建国前后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思想的发展变化	(72)
刘少奇对我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贡献 ...	(87)
对社会主义的探索.....	(103)
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探索.....	(103)



刘少奇的一生

刘少奇与中共八大政治路线的确立·····	(114)
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129)
刘少奇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156)
刘少奇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大贡献·····	(165)
刘少奇与多党合作制度·····	(187)
全力纠“左”力挽危局·····	(200)
刘少奇对“大跃进”时期“左”的错误认识·····	(212)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前后·····	(227)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贡献·····	(245)



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朱德（苏维埃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周恩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王稼祥（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秦邦宪（中共中央总负责人）、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参加会议的还有：刘伯承（红军总



刘少奇的一生

参谋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敌人力量强大,二是根据地政府和各级组织对战争支持不够。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动承担了一些责任。接着,会议围绕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展开了讨论。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集中讲了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军事上的错误。他说:如果说敌人力量强大,为什么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根据地的政府和群众对反“围剿”战争是大力支持的,驳斥了博古关于根据地政府和群众支持不够的说法。王稼祥发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表示拥护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张闻天发言同意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并且强调指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周恩来发言明确提出要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建议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也在会上发了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同意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博古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不同意大家的批评,李德为



自己的错误辩解、拒绝大家对他的批评。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决定主要根据毛泽东发言的内容,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个决议起草后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6日中央油印印发了这个决议。

《决议》否定了博古的报告,认为基本上是错误的。《决议》列举大量事实,说明红军在主观上、客观上均具备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条件,明确指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在敌人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的情况下,我们的战略战术应该是决战防御(即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敌人。然而。我们却以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以分散兵力的作战方针代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违背了我军战略上持久,战术上速决的基本原则。放弃诱敌深入的方针,而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造成严重损失,使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

《决议》指出,政治上,“左”倾机会主义者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没有利用敌人内部的第一矛盾冲突,拒绝援助福建事变,丧失了打破“围剿”的良机。

《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问题上,“左”倾机会主义者同样犯了原则错误。“在苏区内同敌人拼命抗战、大量



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退出苏区变成了一种恐慌失措的逃跑的与搬家式的行动。在干部中群众中关于这种战略转变没有解释,组织庞大的后方机关使行军作战受到困难,使所有的部队变成掩护队。

《决议》指出,在领导作风上,“华夫同志恶劣的领导方式”,在军委内造成了不正常现象,博古同志不但不批评纠正、反而支持。他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是李德、博古、周恩来 3 人,而李德、博古负主要责任。

遵义会议主要作出四项决定:1. 改组了党中央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2. 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 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会后不久,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又称



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从此，中国革命就在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



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抗战 时期形成过程中的刘少奇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她从遵义会议开始并逐步形成的,主要成员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这个领导集体形成的过程,实际上是全党思想统一到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过程。没有这个统一,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成为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就不可能有抗日战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本文仅就这个领导集体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历史作用,作一初步探讨。

刘少奇在党的白区工作中,敢于反对“左”倾错误的领导,能够独立地把握正确的方向,为转变白区工作局面作出贡献。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



“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当时，毛泽东在苏区，领导农村武装斗争；刘少奇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他们在不同的战线上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

1931年秋，刘少奇从苏联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在这期间，他在对工人斗争的形势与策略，对国民党工厂法、工会法的态度等问题上，与临时中央发生了意见分歧。同年10月，刘少奇两次上书中央，陈述自己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有关的正确策略和主张。他先后发表多篇文章，阐述罢工策略的运用、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的结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合，以及对待黄色工会的态度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但是，临时中央否定了刘少奇的正确意见，并对他作了一个“总的批评”，指责他“有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对黄色工会投降”、“有合法倾向”等。1932年3月14日，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撤销了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在同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也因为抵制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而被临时中央指责为右倾保守。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遭到错误的批评，会后被迫离开红军前方指挥的岗位，而到后方医院去“休养”。

刘少奇与毛泽东对于“左”倾错误路线的共同认识和遭受打击的相似经历，成为刘少奇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们政治结合的基础。

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地



刘少奇的一生

位,但是在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中,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依然是主要危险。为了扭转这个局面,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代表的身分,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

刘少奇到北方局后,在《火线》等党内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从思想理论上系统地揭露和批评了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危害,阐明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使白区工作从指导思想到斗争策略,以及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和工作方式,逐渐转变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同时,他还根据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提出华北党的任务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4页。】。强调“要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就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北方局通过各方面关系,广泛地接触社会名流、学者,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军队中上层军官转向抗日,“共组北方联合战线”。经过不长的时间,迅速打开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创造出“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中空前未有过的成绩”【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

由于当时党内“左”的积习很深,许多同志对“左”倾错误还缺乏认识,一些在“左”倾策略指导下工作惯了的同志,对过去工作中所熟悉的那一套还自信为正确,以至在回顾历史、总



总结经验的过程中，“不少同志提出过去的领导路线是否错误的问题”。1937年2、3月间，刘少奇连续给中央写了《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四封信，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指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左’倾机会主义的传统”“基本上没有纠正”，“这些错误在党内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损害也最大”。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白区工作会议，系统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经验，讨论革命新时期白区工作的方针。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继续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再次强调“坚决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会上在讨论刘少奇的报告时，发生了意见分歧。争论的中心问题是：过去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否犯了“左”的错误。6月1日至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6月3日，毛泽东发言明确支持刘少奇，指出：“少奇的报告是基本上正确的，错的只在报告中个别问题上。少奇对这个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他系统的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注：毛泽东：《群众工作问题》，1937年6月。】。在当时，毛泽东对中央领导同志从总体上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几乎是没有的。

刘少奇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为实现中央提出的“发展



刘少奇的一生

华中”的战略任务再作贡献,成为党内公认的正确路线代表之一。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从全党来说,思想路线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全面贯彻中央的正确路线在部分地区,还有相当大的阻力。在抗战初期华中地区党的工作是由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长江局领导。王明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应竭力促成在国民党政府基础上的全国的团结统一的指示,宣扬了一些右倾投降的主张,轻视毛泽东提出的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执行中央关于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仍然把华中工作的重心放在大城市。按照刘少奇后来的说法,“华中的行动路线,与当时中央在抗战初期的行动路线是不同的,或者是相反的”【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68页。】,造成了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在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由刘少奇任书记。

刘少奇到华中以后,以主要精力领导敌后游击战争,他首先指出王明的错误主要在于:只注重帮助国民党军队抗战,只求得统一战线的发展,不注重组织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注意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其次,在党内军内广泛宣传中共中央的全面抗战路线,说明华